

严耕望 著

治史三书

治史经验谈

治史答问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严耕望 著

治史三书

治史经验谈

治史答问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治史三书/严耕望著. — 2 版,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08-09894-7

I. ①治… II. ①严… III. ①史学—研究方法 IV.
① K0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8288 号

责任编辑 何晓涛

封面设计 肖晋兴



世纪文景

治史三书

严耕望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9.25
插页 2
字数 249,000
版次 2011 年 6 月第 2 版
印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09894-7/K · 1763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治史经验谈

序言 / 3

一 原则性的基本方法 / 6

- (一) 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 / 6
- (二) 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 / 12
- (三) 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 / 15
- (四) 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 / 17
- (五) 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 / 21
- (六) 其他几点意见 / 23

二 几条具体规律 / 25

- (一) 尽量少说否定话 / 25
- (二) 不要忽略反面证据 / 29
- (三) 引用史料要将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断章取义 / 33
- (四) 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

2 治史三书

后期改编过的史料 / 35

(五) 后期史料有反比早期史料为正确者，但须得
另一更早期史料作证 / 40

(六) 转引史料必须检查原书 / 42

(七) 不要轻易改字 / 44

三 论题选择 / 47

(一) 具体问题与抽象问题 / 47

(二) 问题的实用性 / 49

(三) 大问题与小问题 / 51

(四) 自己能力与材料情况 / 55

(五) 检查论著目录 / 57

四 论著标准 / 60

五 论文体式 / 65

(一) 常行体 / 65

(二) 纲目体 / 66

(三) 纲目变体 / 70

(四) 复合体 / 71

六 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 / 74

(一) 引用材料方式 / 74

(二) 注释方式 / 77

七 论文撰写与改订 / 81

八 努力途径与工作要诀 / 85

(一) 立志与计划 / 87

(二) 工作要诀 / 90

九 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 / 99

(一) 健强身体、健康心理 / 100

- (二) 一心力、惜时光 / 102
- (三) 淡名利、避权位 / 103
- (四) 坚定力、戒浮躁 / 105
- (五) 开阔胸襟 / 106
- (六) 慎戒执著 / 107

治史答问

序言一 / 113

序言二 / 114

- 一 我研究历史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 115
- 二 我在中学大学读书时代的课外阅读 / 117
- 三 我对于政治制度史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 122
- 四 我对于历史地理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 124
- 五 我的研究重心何以放在唐代 / 127
- 六 我对于上古史与考古学的兴趣 / 129
- 七 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脚的园地 / 131
- 八 我对于唐诗史料的利用 / 134
- 九 我今后的撰述计划 / 139
- 十 研究历史不要从哲学入手 / 141
- 十一 研究中国史不必要从中文入手 / 142
- 十二 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工具，不能以运用理论为主导方法 / 145
- 十三 “无孔不入”、“有缝必弥” / 148
- 十四 目录学与校勘学 / 160
- 十五 年龄与撰述 / 164
- 十六 前进与落伍 / 166
- 十七 史学二陈 / 169
- 十八 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 / 176
- 十九 翻译工作的重要性 / 182

4 治史三书

二十 我购藏书刊的原则 / 186

二十一 我对于中国通史讲授的几点意见 / 190

附录一 严耕望先生访问记（黄宽重） / 196

附录二 《唐代交通图考》序言 / 203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序言 / 215

上篇 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 / 217

下篇 从师问学六十年 / 235

附录一 我与两位王校长 / 283

附录二 我对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感念 / 290

附录 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 294

——敬悼严耕望学长（余英时）

治史经验谈

序 言

我对于历史发生兴趣，当追溯到高中读书时代听李师则纲的一次讲演，题目大意是“历史演进的因素”，同时又读到梁任公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后来也读了些西方学者史学方法论之类的编译本，所以方法论对于我的治史不无相当影响。不过当我在中国历史方面工作了几十年之后，总觉得文科方面的研究，固然也要讲方法，但绝不应遵循一项固定的方法与技术。只要对于逻辑学有一些基本观念，如能对于数学有较好的训练尤佳，因为数学是训练思考推理的最佳方法，而任何学问总不外是个“理”字。此外就是要多多的仔细阅读有高度成就的学者的好著作，体会作者探讨问题的线索，然后运用自己的心灵智慧，各出心裁，推陈出新，自成一套，彼此不必相同。至于方法理论，不妨让一些专家去讲，成为一项专门之学，但实际从事历史事实探讨的人只能取其大意，不能太过拘守。太过拘守，就太呆板，容易走上僵化的死路上去；或者只是纸上谈兵，并无多大用处。

大约是一九七四年冬，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邀我作一次讲演，内容希能与史学方法有关。我既不太讲究方法论，对于此项邀约自然不很感兴趣，但辞不获已，只得就自己治史经验作简略报告。为欲使诸生能实有受益，所以先写纲要，油印为讲义。纲要分上下两节，上节谈几条原则性的基本方法，下节谈几条具体规律。后来又就此类问题在我所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班上谈过一两次。一九七六年七月应《中国学人》编者之约，就讲义上节，草成《治史

经验谈》上篇，在该刊第六期发表。明年续成下篇，以该刊久未出版，而半篇论文未便改投他处，所以迄未刊行。

自上篇发表以来，颇受一些青年读者的重视，促能多写一些此类文字，乃想就平日与诸生闲谈中涉及有关治史经验诸问题而为前两篇所未论及者，续为写出，对于青年史学工作者或有一点用处。今年七月初，自美国游罢归来，趁未开始研究工作之前，一口气写成《论题选择》以下七篇，并就旧稿续作改订，分别为篇，与新作合编为一小册，仍题曰《治史经验谈》。回忆杨联陞兄一次来港，闲谈中谓我对于后辈青年当有较大责任。此语对于这本小册的写作，可能也有催生作用。朋友相勉，特以识之。

这本小册，只是我就所想得到的若干问题，随意漫谈，说不上史学方法论，充其量只能说是我个人的体验，个人方法而已。综合这九篇文字，扼要言之，不外下列几点。原则上：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处下功夫；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意见），随宜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拘成规。方法是：坚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拙为巧，以慢为快，聚小为大，以深楔精细为基础，而致意于组织系统化。目标在：真实，充实，平实，密实，无空言，少皇论，但期人人可以信赖，有一砖一瓦之用；若云文采，非所敢望，光辉则心向往之而已。最后一篇特措意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要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健康纯净的“学术人”，此实为学术成就的最基本条件。至于探索问题的技术，则本编甚少涉及。因为技术细节，很难具体言之。大约论题若能以述证方式，排比材料，即可达成结论者，较易为功。若是无直接有力证据，必须深一层辩论证实者，即要委蛇曲折，剖析入微，无孔不入（此谓攻，谓建立一项论点，非必攻击别人论点），有缝必弥（此谓守），务期自己论点能站得稳，无懈可击。这就要随宜运用匠心，解决问题，但很难归纳出几条方式，具体扼要言之，

所以也很难以笔墨相传授，目今讲坛一般教学方式也很难传授。只有古人学徒方式，学生即在身边，遇有使用细致技巧处，随时指授，较易见功。但此种学徒式之教育方式已成过去，今日青年好学者若想学习前人研究技术之精微处，只有取名家精品，仔细阅读，用心揣摩，庶能体会。若都只匆匆翻阅，一目十行，只能认识作者论点，至于研究技巧，曲折入微处，恐将毫无所获！我在中文大学研究院“中古史研究”课堂上，常提出研作较精之论著，就其探讨入微处，为诸生讲解，立意即在帮助青年揣摩他人精品的研作技巧，以为他们工作之一助。但亦惟程度较高，好学深思者，能欣赏，有受益，一般青年仍仍少领会！好在一般论题只用述证方式已可解决，必须深入曲折辩论者究占少数。而且现今写论文，能深入曲折辩论者已较少，能欣赏的人也不多，盖学风日下，率就浅易，此如歌唱，时代曲流行，京剧演员吃力不讨好，因此我也不想花太多功夫在此等处多费笔墨！

近五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界，人才辈出，朗若月星；燭火之光，何足自道！但念近代史学巨子多半天分极高，或且家学渊源，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后来学子可能自叹不如，不免自弃。我的成就虽极有限，但天赋亦极微薄，一切迟钝不敏，记忆力尤坏，幼年读书，三两百字短文亦难熟诵。老妻曰，无聪明，有智慧，这话适可解嘲！相信当今能入大学受教育的青年，论天分必大半在我之上，举我小成之经验与生活修养之薪向以相告，或能有一点鼓励作用！所以毅然违背我一向做人原则，不揣浅陋，不避自伐之嫌，将自己的工作经验献给青年史学工作者，是否有当，实际有用，在所不计！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序于香港沙田吐
露港西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十月二十日增订再稿于九龙塘狮子山下霞
明阁寓所；八〇年四月十五日三稿毕功

一 原则性的基本方法

我在序言中已说过，治史不能机械的拘守某一类固定的方法，但也不能不注意一些大原则大方向。我觉得治史学有几条应注意的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问题，也有一些应注意的较具体的规律。兹先就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问题提供一点意见。

（一）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

专精与博通两个概念当为一般人所知，不必说，但尤着重“精”与“通”两字。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治学要能专精，才能有成绩表现，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所以近代治学愈来愈走上专精之路，要成为一个专家。虽然最近已注意到科际的研究，但过分重视专精的观念仍然未改。其实，为要专精，就必须有相当博通。各种学问都当如此，尤其治史。因为历史牵涉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甚至于出笑话。所以治史最为吃力，很难有一个真正的青年史学家！

治史的博通可分从两方面谈。第一，史学本身的博通。即对于上下古今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尤其对于自己研究的时代的前后时代，要有很深入的认识，而前一个时代更为重要。若治专史，例如政治史、政制史、经济史、社会史、学术史等等，治某一种专史，同时

对于其他的专史也要有很好的了解，至少要有相当的了解。第二，史学以外的博通，也可说是旁通，主要的是指各种社会科学。

先讲旁通，要想真正旁通各种社会科学，虽然断然做不到，但至少要对各方面有一点皮毛知识，有一点总比毫无所知的好。现在时髦的看法，要以社会科学的观点研究历史，于是各种社会科学家都强调自己的立场，以为研究历史非用我的方法理论不可。记得前年台湾有些史学家与一些社会科学家开过一次联席会议，社会学者、人类学者、经济学者、统计学者、心理学者等等，就各人强调自己的方法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法宝。当时有一位历史学者说，这样讲来，我们历史学者就无用武之余地了！其实各方面的意见都有问题。治史有考史、论史与撰史的不同，而相辅为用。考史要把历史事实的现象找出来，论史要把事实现象加以评论解释，然后才能作综合的撰述工作。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于论史最有用，对于考史撰史的用处比较少，社会科学家要越俎代庖，也只能做部分的论史工作，考史撰史还是非全部由史学家做不可！至于各种社会科学对研究历史都有帮助，那是绝对正确的，但也各有局限性，不是随时都可用得上。几年前有一位颇有名的史学界朋友，告诉我：“要用统计法治史。”这话本不错，但史学问题哪都是统计法所能解决的！其实我最喜欢用统计法。三十多年前，我研究汉代地方官吏的升迁，就是用的统计法，根据统计数字，作成升迁图^[1]，在那时可谓是极新的方法了。但历史材料不是都能量化的，难道不能量化，我们就不做？现在我写《国史人文地理稿》，也喜欢用统计法，还特别搜购了一部《地理统计学》来看。那里面所讲的方法非常好，但历史已过去了，很少如意的资料让我统计！所以方法虽好，但材料不允许，用不上，奈何！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方法理论治史学，也

[1]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上《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十章《任迁途径》。

同样都有局限性。有些人从政治学的观点批评政治史学家的成绩，从经济学的观点批评经济史学家的成绩，从社会学的观点批评社会史学家的成绩，总觉得不好，那都是不切实际的苛责。他们忽略了历史已成过去，人家那种成就也许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哪有社会科学家研究目前的人类社会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与方法去作调查，材料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样方便！然而我们不能否认有些社会科学的知识对于研究历史实有极大用处。就以我的经验言：我在高中读书时代写了一篇《尧舜禅让问题研究》，我认为尧舜禅让只是部落酋长的选举制，这就是从人类学家莫尔甘（L. H. Morgan, 1818—1881）所写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悟出来的。儒家不了解当时实情，比照后代传子制看来，尧舜之事自是公天下的禅让，这是美化了尧舜故事。等到曹丕篡夺汉献帝的君位，但表面上仍要汉献帝写一张最后诏书，说是把天下让给姓曹的，所以曹丕就想到“尧舜之事吾知之矣”，意思是说舜之代尧，禹之代舜，也只是和他自己一样的篡位而已，这又把尧舜故事丑化了。但我若没有一点人类学知识，就极可能不能悟到这一点。又例如我撰《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1]，说明尚书六部与九寺诸监职权地位之不同，以及两类机关的关系。按唐代六部与九寺诸监的职权似乎很混乱，一千多年来都搞不清楚而有误解。我详征史料作一番新解释，说六部是政务机关，六部尚书是政务官，九寺诸监是事务机关，他的长官是事务官，这两类机关有下行上承的关系。如此一来，各方面看来很不合理的现象都变成合理了，这也是从近代行政学的观念入手的。举此两例，可见社会科学对于历史研究有多少重要。但社会科学的科别也极多，每一种学科都日新月异，一个历史学者要想精通各种

[1] 《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初稿刊《史语所集刊》第二十四本（一九五三年），改订稿刊《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一九六九年）。

社会科学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我们总要打开大门，尽可能地吸收一点！尽可能予以运用！纵不能运用，也有利于自己态度的趋向开明！

至于历史本身的博通，更为重要。但这是本身问题，要博通比较容易。本身博通的重要性可从两方面讲。第一是消极的，可使你做专精工作时不出大错，不闹笑话。我举两个例如下：

其一，法国藏敦煌文书第 3016 号纸背云：

天兴（？）七年十一月，于阗回礼使、内亲从都头、前高昌令、御史大夫、检校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索全状文。

日本有一位敦煌学专家屡次提到此条，以为北魏道武帝天兴（他释为天兴）七年（西元四〇四），当为敦煌文书之最古者。其实大误。我们只看索全的官衔，马上就可知这一文件不可能早过晚唐，可能是五代时期的。何以见得？上柱国的勋名创自北周，朝廷中几个功勋最高的大功臣，始能蒙赐，知此文件绝不能早在北周之前。以一个县令拥有“御史大夫、校检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的头衔，那就不会早过安史之乱。又有“回礼使、内亲从都头”的衔名，那就不会早过晚唐，所以至少“天兴”二字当有一个模糊不清，他误释为“天兴”了。其实这些官衔，在两《唐书》、《五代史》中常常见到，都在安史乱后，尤其晚唐以后，安史乱前是绝不一见的，所以不必是讲制度史的人始能知道。那位先生研究敦煌文书，就该对于南北朝隋唐五代的历史各方面都有相当了解，然而他事实上只在敦煌文书那一点上去钻，所以出此大错！

其二，《通鉴》一九九永徽二年纪有一条：

发秦、成、岐、雍府兵三万人。

有一位研究府兵制度的专家，引此条作解云，“府兵是指这几个都督府的兵”，又云“此时诸州多置都督府，府兵即指州都督府的兵”。按至少“这几个都督府的兵”绝误。因为《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各州置都督府的经过极详，秦州此时置都督府，成岐雍三州根本不是都督府。解释此句，“的”字应放在“府”字之前，不应放在“府”字之后，也就是说发这四州的府兵，不是发这四州都督府的兵。他是位讲府兵制度的专家，这条史料中的“府兵”正是他所要讲的，但却未读懂！其原因就出在只求专精，讲府兵制度，而忽略了其他制度！又不肯勤于查书。一个谨慎的史学家写专门论著时要勤于检书，凡说一句话，没有把握，就得去查，不可信口开河！

能博通不但可避免不应有的错误，而且在积极方面可以帮助我们为史事作解释。也举两个例子如下：

其一，秦国之能统一天下，过去学人的解释，总不外秦国政治改革成功，外交运用成功，加以地势优良，进可攻退可守。四五十年前又从时代思想方面作解，以为当时大一统观念已形成，一般人民已无宗国之见，为秦国统一排除了心理上的障碍。例如钱宾四师的《国史大纲》可为代表。这些讲法，都不错。但另外还有好多原因。例如若从当时各国地方经济社会民风的角度去看，秦国民杂西戎，民风强悍，关东三晋民风较秦为弱，对于秦人极为畏惧，最东齐国民风又较三晋为怯弱。而就各国民间经济状况而言，秦国最贫穷，齐民最富庶，三晋也介乎两者之间。所以当时的情形是地方愈东愈富庶，愈西愈贫穷，但民风则愈东愈怯弱，愈西愈强悍。以富家怯弱子弟去当贫穷勇悍的士卒，自然无法致胜。所以秦国土卒虽赤膊上阵，但勇气百倍，东方士卒虽被精甲执利兵，但一遇上秦卒，内心就生怯意。况且秦国领有中国最佳的战马产区，所以骑兵特强。以悍卒乘壮马，如虎添翼，绝不是东方的怯弱步兵所能抵拒！只有赵国北境也产马，训练骑兵，所以战国后期能与秦国一抗的只有赵